

Walking the Tightrope of Rea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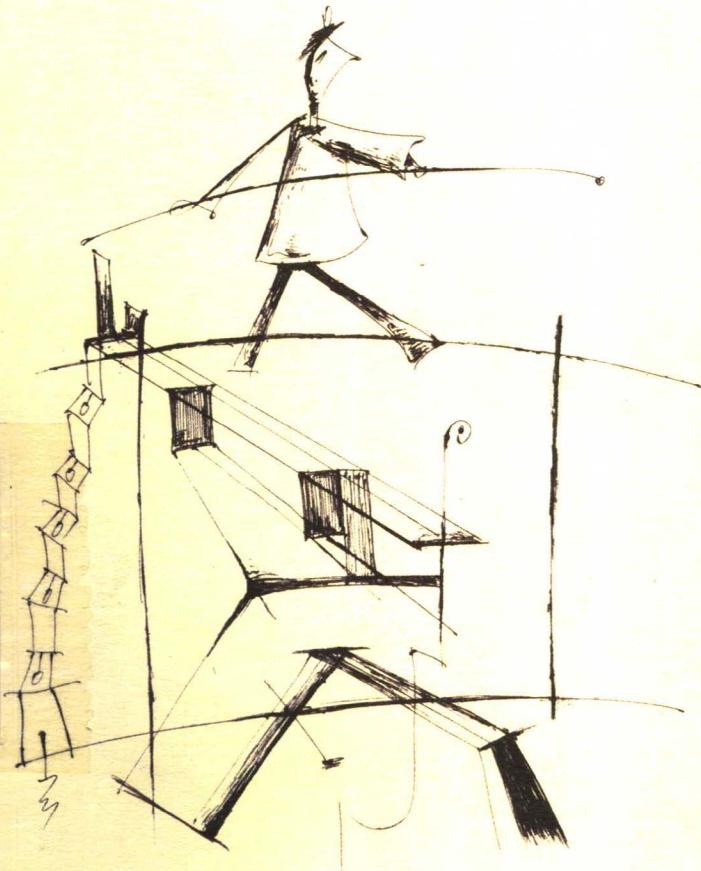
The Precarious Life
of a Rational Animal

[美] 罗伯特·福格林 / 著

陈蓉霞 / 译

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

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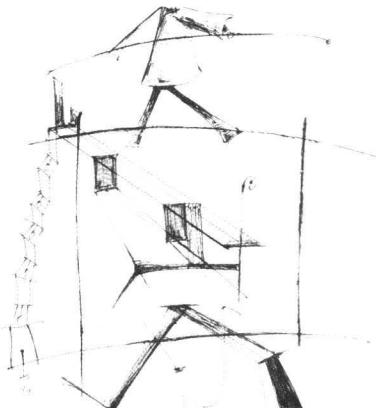
Walking the Tightrope of Reason

The Precarious Life
of a Rational Animal

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 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

[美] 罗伯特·福格林 / 著

陈蓉霞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 / (美)福格林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225-167-0

I. 行... II. ①福... ②陈... III. 福林格, R.—哲学思想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392 号

行走于理性的钢丝上: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

(美)罗伯特·福格林 / 著 陈蓉霞 / 译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15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5 000

定 价: 27.00 元

献给我的儿子拉斯·福格林

在一颗小星星下

我感到抱歉

因为把巧合当做必然；

我感到抱歉

万一我又误会了必然。

.....

我感到抱歉

因庞大的问题却只有渺小的答案。

噢，真理，不要对我太过眷念，

噢，庄严，请对我宽宏大量，

难解的生存之谜啊，我却只能抽取其中的纬线，

噢，灵魂，请不要责备，说我极少与你携手相伴。

我对每一件事情说声抱歉，

因为我不能每每出现；

我对每一个人道声歉，

因为我不能代表每一个你与他出现。

我知道，只要我活着，

就无法为我的存在辩解，

因为我就是自己的牵绊。

噢，言语，不要见怪，

我借来厚重的词用以表现，

随后却又费力地使它们向轻盈转变。

前　　言

眼下这本不厚的小书是我于 1995 年作为罗曼尼尔·菲·贝塔·卡帕 (Romanell - Phi Beta Kappa) 哲学教授而作的一系列讲座的产物。菲·贝塔·卡帕国内分会所要求的是，为其成员提供一系列涉及面较广的讲座。通过该机构的赞助，我在达特茅斯学院作了三个公开讲座，总题目为“理性动物的不确定生活”。在修订的过程中，这三个讲座的内容就此成为本书的七章。

本书设定的对象，正如讲座面对的听众一样，是具有一定文化层次的读者。但其实还有一类读者，他们让我绞尽脑汁，那就是我的哲学专业的同事，他们的看法值得认真对待。他们有可能相当理性地对于本书中的每一论点提出真正富有挑战性的意见。于是，在修订原始讲义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意他们而不是起初设定的读者。这是怎么了？最后我决定还是回到原先的出发点，而仅仅只是描述这些意见是如何激发了我。至于这些意见

是如何激发了专业哲学家，他们又会提出怎样的反驳，在大多数的篇幅中，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重点。

然而，有一个问题在此必需说明：我似乎正在把本该属于其他人的想法说成是我自己的。在其《逻辑哲学论》一书的前言中，维特根斯坦以下述引人注目的“放弃声明书”的形式带出了这一问题：

我不希望判定，在多大的程度上，我的工作与其他哲学家的那些观点相符合。确实，我在这里写下的内容并不见得在细节上有多少创意，为什么我没有列出出处的理由就是，对我来说，我所具有的这些想法是否已被其他人提出，这无关紧要。

尽管已有这样的放弃声明，但维特根斯坦还是承认他得益于“弗雷格的伟大著作，以及其朋友伯特兰·罗素先生的作品”。因为此刻我正在提供一个相似的放弃声明，那就也让我承认所要感谢的人。主要有四位：古代皮浪学派的怀疑主义，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的著作；大卫·休谟，尤其是他的《人性论》；康德，尤其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辩证论”部分；维特根斯坦，主要是他的《哲学研究》。但本书不是上述著作的综合，也不是对这些作者相异之处的调和。我乐意列出他们，是因为本书中任何精彩的内容来自于他们；而其余须引以为责的内容则由本人承担。

我还要感谢一系列的机构和个人,因为他们的帮助和鼓励才促成了这一工作。这一过程开始于菲·贝塔·卡帕的达特茅斯分会,它任命我担任罗曼尼尔·菲·贝塔·卡帕哲学教授。菲·贝塔·卡帕的国内分会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推荐。没有后者的支持,这一工作就不可能完成。

在 2001 年的春天,作为博格里阿斯科基金会莱格利安艺术和人文研究中心的成员,我还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以便完成本书的初稿。我还极为赞赏来自于达特茅斯学院的慷慨支持,它的机构、研究助手以及与 Sherman Fairchild 人文学科教授职位有关的薪水。

自 1995 年起,在达特茅斯学院所开设的公开讲座中,我把这些内容呈献给了许多听众。我欣赏随后展开的生动讨论,从中受益匪浅。我还赞赏来自牛津大学出版社无名读者的支持和有益的建议。我是幸运的,因为 Peter Ohlin 和 Catherine Humphries 承担了繁杂的通读全书的工作。我还要感谢 Jane Taylor 和 Florence Fogelin,因为他们那娴熟的编辑技巧、有见识的评论以及对英语的出色把握。

数年来,我的同事 Walter Sinnott - Armstrong 一直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提出种种批评,对于我的哲学概念,有时充满鼓励,有时则激烈反驳,这两种方式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本书作出了贡献。我的儿子,拉斯·福格林 (Lars Fogelin),尤应提上一笔。尽管不是职业哲学家,他正在攻读

考古学博士学位，但却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些哲学论点。在我看来，由于对他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从而使本书少了许多偏狭。所有上述原因，它们或许耽搁了工作进程，但却使本书获得更好的效果。

文本和引用

为简洁之故，我尽可能简单地在注释中保留了学术研究所需的引文资料。本书所引用的更详尽的资料见《参考资料》。

目 录

1	前 言
1	导 论
17	第一章 为什么要服从逻辑定律
43	第二章 两难困境及其悖论
75	第三章 纯粹理性及其幻觉
105	第四章 怀疑论
141	第五章 对于这些挑战的适度反应
161	第六章 关于情趣问题
181	第七章 结语
191	译名对照表
210	参考文献
220	译后记

导 论

作为理性动物，我们生活在一个险象环生的世界中。我们所生存的宇宙极度地、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复杂。对此，爱因斯坦曾有评论：“上帝是狡黠的，但他绝不是故意这样。”^[1]不过若考虑到来自科学前沿的报告中所体现出来的奇异性，宇宙似乎是越来越精彩无比。然而，这种复杂性和奇异性并不必然使我们这些理性动物的生活充满不确定，它们只是使生活充满了艰辛。

随之出现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因为作为人类，我们也是非理性动物，在所有的动物中，仅我们拥有这一能力，即把信念构筑在由我们随意想像的稀奇古怪的虚幻事物基础之上。迷信，既有体制化的、也有非体制化的形式，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它既是悲惨的，但又够不

[1] 这是爱因斯坦较早的、也是更为著名和正式的一个评论的修订版，“上帝是不可捉摸的，但不带恶意。”

上悲惨。然而,非理性不是本书的主题,本书不关注从外部取代或腐蚀理性的因素。本书关注的是内在于理性构架中的问题,亦即,使理性思维本身成为一种不确定活动的问题。

本书的一个主导观念是,不受束缚的理性,会迫使我们进入两个相反的方向之一。其一是形而上学的方向,至少,其传统形式就是试图用一种纯理性的(先天的 *a priori*)因素,来说明实在那稳定内在的结构。必定存在这一结构,那正是理性自身的要求。其二是相反的方向,因为当理性趋于极限时,就会带来自我摧毁,从而引出激烈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令人惊讶的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向,尽管表面上似乎处于两极,但通常却共享一个潜在的命题。比如,

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无意义
的。^[1]

这一有条件的陈述也能被对等地表述为一个析取命题,那就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句型出现:

要么上帝存在,要么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拒绝上帝的存在,那么,我们就等于承认世界的无意义。相反,如果我们拒

[1] 除非有另外的说明,否则此处所讲的上帝就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意义上的神。

绝世界的无意义,那么,我们就等于承认上帝的存在。一个相关的原则来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

如果不存在上帝,那么,所有事情在[道德上]上都是可能的。

这一原则试图在宗教和道德虚无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真实的情形,即他们发现自己必须对于这类刻板的“非此即彼”命题作出选择。这些选择还有其他例子,它们来自不同领域。

要么存在绝对的道德标准,要么根本就没有诸如道德这样的东西。

要么一个文本具有稳定明确的意义,要么它就只是毫无意义的陈述。

要么某些事情是必然的,要么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是可能的。

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我们都面临要在这两种情形之间作出选择:一面是次序、统一和必然结局;另一面则是无序、多元和捉摸不定。这些选择命题对不同的人们会带来不同的冲击效果。哪种选择才是根本的和迫切的,这在不同的人中也有不同的反应。对于某些人来说(实际上极少数),所有这些选择都谈不上意义,只不过是一种矫情做作而已,或顶多,仅是在闲暇时刻、休息之余才会考虑的事情。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这些根本性的选择似乎迫使我们

们不得不去面对。它们既重要又无可回避。当我们从日常事务里抽身，进入一个特定的领域，比如哲学思维中时，这一情况就无可回避地出现了。

当面临这类选择并要作出决定时，通常涉及两个步骤。首先，得承认这类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带有强迫和强制性质的。^[1]其次，才是决定哪一选项可被接受。第一步更重要。第二步，在两个选项之间择一，倒不怎么有趣，因为它所反映的也许只不过是个人的性格而已。来看有神论和道德虚无主义之间的选择，它迫使我们面对这一命题：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每一事情在道德上都是可能的。这一选择可能会带来肤浅或是深刻的理解。肤浅是指：除非人们被神的惩罚这类威胁所恐吓，并且还被天堂的回报这类引诱所动心，否则人们就难以做出高雅得体的举动。圣诞老人（应这样理解：耶稣基督以令人敬畏的姿态隆重回归）正在回到小镇。

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我们这样命名它）以

[1] 这在某些方面与威廉·詹姆士的说法相似，亦即，当面临的选择是“强迫的、生动的和重大的”时，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詹姆士告诉我们，一个选择，如果它建立在“一个逻辑析取命题的基础上，绝无可能回避选择”，那么，它就带有强迫性。一个选择是否属于强迫的，与选择如何表述无关。例如，接受还是不接受上帝的存在就是一个强迫选择。另一方面，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选择就不是强迫的，因为还有第三种可能，即不可知论。我相信，思考选择（无论是否是强迫的）如何变得生动和重大，这更为有趣。这正是我在此所要追究的论题。詹姆士的有关观点见他的《意愿到信仰》（*Will to Believe*），3ff。

更深刻的理解也是可能的。萨特在下述文章中就是这样做的：

存在主义者……认为，若上帝不存在，那会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为在概念的天堂中寻找价值的所有可能性都将随他的消失而消失了。不再存在一个先天的上帝，既然没有无限完美的意识可沉思它。这样的理解无处可寻，即上帝存在，我们必须诚实，我们必须不撒谎。因为事实就是，我们处在一个仅仅存在人类的行星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将可能”。那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1]

对于一个如萨特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导致人类存在的本质具有一种深深的荒谬（空虚、绝望）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无论取其哪一个选项，它们都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决定。我们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面对这种选择。一个有神论者或许会严肃地提问：因为不允许在消防栓面前停车，那就必然可推出存在一个上帝？当然不。反之，一个虚无主义者

[1] 萨特：《存在主义》，26—27。应当注意，萨特后来放弃了在上述句子中所表达的许多概念，但这丝毫不减损其吸引力。

会说,因为不存在上帝,就允许人们在消防栓面前停车?这一设想并不见得更有深度。在这里,有神论者和虚无主义者联手嘲弄这类有关消防栓的争论,将此看作是肤浅和空洞幼稚的。可见这类哲学争论源于一种共同的约定,即双方都认可并向这种根本选择靠近。因为就此达成共识,故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些试图在心灵深处回避对一种根本选择的承认的人们。与根本选择有关的问题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即它们远离人间烟火。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对此尚需加以密切考察。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它既不是道德,也不是宗教,它仅仅力图阐述哲学思维的一种永恒特征。于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就成了一种倾向,即根据自己列出的带有强迫性质的选择,并通过给出相反的选项,从而达到根本不同的立场。这些选择,当它们出现在诸如宗教和道德这样的领域,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恐惧感,但它们却有一种穿越整个理智领域、甚至深入至最乏味地带的倾向。请看下列命题,它们由哈佛哲学家刘易斯(C. I. Lewis)所提出,刘易斯被公认为是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特最远的哲学家,这些命题见之于其《知识及其价值的分析》一书中,该书出版于1946年,被认为是一部严肃、严谨的权威著作。

如果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么,某些事情

必定是确定的。^[1]

上述句子,带来的恰恰是这种“非此即彼”的句式。我们可以称其为“刘易斯选择”:

要么某些事情是确定的,要么没有任何事情甚至是可能的。

换言之,因为某些事情是可能的,某些其他事情必定是不变、确定的。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确认某些信息至少是可能的,刘易斯因而得出结论,至少某些事情必定是确定的。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任务,即把这些带有根本确定性的事物区分出来,显示它们是如何为可能性提供支持的。就我所知,迄今没有人认为刘易斯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确实,现在人们似乎已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在知识理论上,这种基础主义者的策略难有成功机会。

不过,基础主义者和其对手之间争论的错综复杂性不是我眼下的关注所在。^[2]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种根本选择的来源,它源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冲突:要么,某些事情是确定的;要么,因为这种确定性的丧失,则所有的确定性都不复存在。刘易斯认为,这种选择是由于下列推理而带到我们面前的:

[1] 刘易斯:《知识及其价值的分析》,186。是 Annette Baier 提醒我注意这一段内容。

[2] 对此更详尽的讨论可见之于第二部分“皮浪的极端怀疑主义的反思”。